

追懷劉湘先生

劉航琛

四川文獻研究社社長周開慶教授為本誌撰「劉航琛的生平」已於本期刊出，劉航琛參贊劉湘戎幕，致力四川建設，擁護中央，鞏固統一，出兵抗戰，厥功甚偉，茲特再摘錄劉航琛序劉湘先生年譜一文中有關航琛贊劉湘戎幕期間所經歷的重大事件，以供讀者參閱。

受命中央率先清共

余初聞甫澄（劉湘先生字甫澄）先生之名，在民國二年。其時先生為進駐瀘州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駿屬下之營長，旋即因戰功升任為團長。民國九年端午，余自北京返川省親時，得聞當時任滇川黔三省聯軍統帥的唐繼堯，對川軍將領中倡導保省自主的劉湘，十分不滿，將升任其所屬旅長廖謙為師長。更因劉湘率領其餘兩旅部眾拒絕命令，唐繼堯即令所屬滇川黔聯軍予以討伐。緣自民國四年冬，蔡錕為反對袁世凱洪憲帝制，率護國軍自滇入川護法起義時開始，滇軍留駐四川，並對軍政地方事務多所干預。尤其滇軍盤據川南富庶之區多年，徵收巨額賦稅，形成喧賓奪主的局面，增加川省同胞莫大的負擔。在此局勢下，甫澄先生倡導川軍自主的保省主張，自是順時應人之舉。當年冬季，余已回北京就學。十年夏，得晤瀘州同鄉康駿駁先生，據告彼係以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之代表身份駐京公幹。蓋劉湘聯合四川將領驅逐滇黔客軍出境，戰事已獲勝利，受各軍推舉出任總司令兼省長。唯北京政府相信傾向於北洋派的川軍將領劉存厚之虛偽報告，而對四川政事時有莫明其妙的荒唐措施。故甫澄先生派康先生以參謀長之身份，代表來京澄清事實。此係余在民國十五年秋季與甫澄先生晤面接觸前，

自當時直接關係人士處所耳聞的情形經過。

民國十五年北伐軍興，甫澄先生欣見國家統一在望，於八月十三日通電，反對吳佩孚，表示願出師參加北伐。同年冬，北伐進展迅速，東南大局粗定，中央發表甫澄先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

民國十六年四月以前，由於國民黨當時容共聯俄政策，使得黨務工作左右為難，往往一地會有兩個黨部推行黨務工作。當時重慶就有兩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其中一個由老黨員黃復生朱叔癡等所主持的省黨部，聽命於上海中央，而由共產黨員楊闇公等所操縱位於蓮花池的省黨部，則直接受在廣州的共產領袖吳玉章的指揮。蓮花池的省黨部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不時發動學生或羣眾的遊行，與推展工運及農運活動。某日，重慶衛戍總司令王陵基據報，蓮花池黨部預定於三月卅一日鼓動學生，利用「重慶工農商學兵反英大同盟」的名義，在打鎗壩召集市民大會，製造暴動。他們的目的，是想藉糾眾滋事，瘋狂暴動來動搖劉湘、王陵基對重慶的控制，以伸展左傾的武漢中央政權。甫澄先生當時指示應付暴動的對策，是決不開鎗彈壓，以免釀成流血事件。但為防止青年受利用，喪失理智，而形成暴動，不可收拾起見，准許衛戍部隊運用兩團人的兵力，換着便衣徒手鎮壓，以防止集會的學生與羣眾

編者

，被人作有組織的結合，而發生團體力量。簡言之，可以打架而不可以打鎗。於是共產黨領導的「三三一事件」，在軍隊不使用武器但有組織的打架分散手段下被鎮壓消弭而未能擴大。因為參加集會而鬥毆的人數累千上萬，結果無論是因打架而死傷，或是因秩序太亂而誤致傷亡的人數，也達百餘人之眾。這一共產黨醞釀唆使的運動，不僅沒有動搖劉湘、王陵基，反而因此使甫澄先生能一網打盡蓮花池省黨部內的共產黨陰謀份子。而其首領人物楊闇公，雖已化裝婦人登輪潛逃，但終於輪船開航前遭查緝逮捕，鎗斃在朝天門外。此一經共產黨渲染的「三三一慘案」，雖經立即電呈蔣總司令報告，但一直未奉中央批覆。因為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分別於四月初開始執行清黨行動，故甫澄先生在重慶的措施，是洞察共產黨陰謀，早著先鞭的肅清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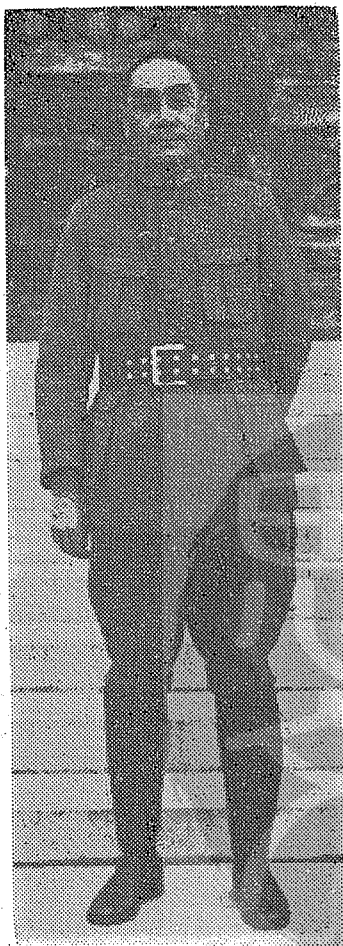
同年六月，國民革命軍第廿一軍所屬各師成立政治部，余奉委為第三師政治部主任。就職日，承甫澄先生親來致賀并訓話。當時在來賓致詞中，尚有廿一軍政治部青年職員張六師君登臺演說。甫澄先生聽張君演說條理分明，頭腦清楚，囑余轉告張君，於次日午後至辦公室晤談。事後張君見告云：甫澄先生詢其志趣如何，有願為助力之意。其後張君經甫澄先生設法遣送日本士官學校深造，畢業後仍逐步予以培植，迄抗戰初期

，已任劉兆黎師副師長，於宣城、廣德一役擊潰日軍長谷川聯隊，虜獲大砲及其他軍械甚多。各界讚譽揄揚不已。足見甫澄先生愛護青年，獎掖後進，有非常人可及者。

任人不疑振興航運

民國十七年多，甫澄先生突自長壽行軍所司令部來電，派余為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財政處處長。次年元月中旬，甫澄先生約余至督辦署談話。余以所任第三師職務兼理銅元局整理復工責任重要，事實上無法到署辦公之理由，請辭財政處副處長名義。甫澄先生除表示對余籌措戰費成績慰勉有加外，并告以委此名義，勿須到署辦公，其意義乃在加深余與先生之幕僚關係。當年五月初某日，同學范崇實君來告稱：甫澄先生囑意由余出任督辦署財政處處長。余以資淺力薄，不克勝任相辭。甫澄先生乃約余辦公時間以後，至督辦署晤談。當時甫澄先生一人在座，約余長談，至今印象深刻，難以或忘。記得甫澄先生一開始便先表明他的意思云：「我請你當財政處處長，並非請你來作官，乃是請你來共事業。應該做的事

業，能力有餘自然順理成章做去，如能力稍嫌不足，亦應盡力為之，做到成功為止」。此外更不厭其詳的說明：「我請你相共的事業就是統一四川。因為自從民國六年以來，四川督軍署就無力負擔全川軍餉，下令各軍就地籌餉，以後遂從此形成割據的局面。十二年來，羣雄競爭，此起彼仆，此進彼退，毫無統一的景象，老百姓的痛苦與日俱增。我隨時都在希望有個人出來完成四川統一的局面，對於國家民衆都是非常有利的事。但是等了十二年，仍沒有人來做此事。因此我想我應該當仁不讓，盡力為之。此即我心目中的事業。如果你認為值得從事，我極端歡迎你與我共事」。至此，余遂決定追隨甫澄先生，共同奮鬥。當時除就事權與責任問題加以區分澄清外，更提出兩項要求，即：(一)不下手令；(二)執行預算不受任何牽制；都蒙允准照辦。自即日起，直到民國二十七年甫澄先生病逝漢口時，前後將及十年間，賓主相處甚歡，因為甫澄先生始終恪守諾言，他不干涉我辦任何事與如何辦事，也從來未曾下過一張動支款項的手令。像這樣信任不疑，徹底授權的情形，在中國官場上可說是難能可貴的



民國二十三年劉湘將軍任四川省主席時的照相。

了。

民國十八年秋某日，甫澄先生因鑒於川江內河航運，幾乎都操縱在外國的航商手中，中國人所組設的大都是只有一、兩艘船的小公司，不僅談不上與外國人競爭，甚至有無法生存之慮。因此囑我召集一次華商輪船業者的會議，希望航業界能够成立一個聯合組織，以與英、日、美、法的外國輪船公司對抗競爭。開會的結果很不理想，因為航商各懷私見，雖然在原則上大家都贊成，但一提到具體辦法，就有人反對，始終難於達成共同一致的合作步驟。最後甫澄先生決定扶植一家中國航業公司使其壯大，逐漸發生力量，合併川江的小公司。結果是決定扶植民生公司。當時民生公司的規模雖小，但其主持人盧作孚有頭腦，有能力，而且為人方正，操守極佳。扶植民生公司的辦法，除了督辦署與四川銀行金融界的財力協助支持外，對盧作孚個人亦由甫澄先生及余等友好數人集資五千元助其入股民生公司，其目的在使作孚成爲享有董事會表決權利的董事兼總經理，而非只能列席董事會只有報告義務的聘任總經理。民生公司經過增資改組後，一方面定購適合航行渝宜、渝涪間定期航線的新船，一方面則以相當價格的股票接收其他同業的船隻，結果在短期內不但使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爲川江最有力量的華商航業公司，統一了川江的航運工作，而且更由於盧作孚出任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職務後，配合運用政府的力量，與民間的愛國心，在不動聲色、不著痕跡的情形下，將外國籍的航運公司置於川江航務管理處的管轄之下。

擁護中央矢志不渝

民國十九年三月，閻錫山、馮玉祥與李宗仁等聯合作亂，反對蔣總司令，而釀成中原大戰。在四川有實力統軍的劉文輝、鄧錫侯與田頌堯等三人，因與閻、馮間早有密議，伺機參與叛亂，

遂於九月六日發出附逆的魚電。甫澄先生曾經向蔣總司令代表曾擴情表示擁護中央謀求全國統一

的政策，矢志不渝，故雖經叛方不惜代價的爭取，甚至在劉、田、鄧等準備聯合用兵威脅下，仍不稍動搖其立場。由於甫澄先生掌握川東地區，扼制出川的咽喉孔道，使劉、田、鄧等無法率兵與中央為敵。中原之戰平定，蔣總司令更增進了對甫澄先生的認識，乃於當年十二月末特派專機到重慶邀約甫澄先生赴漢口晤談。無奈其時甫澄先生因病無法成行，事後時感歉然，迄二十年元月十三日，甫澄先生決定派余為代表前往南京，向蔣主席報告四川軍政大事。行前甫澄先生曾與余數次詳談，囑余代向蔣主席陳述他多年的心願與志業，那就是得中央支助，於最短期內統一四川，然後利用四川的人力和物力來協助蔣總司令最短期內統一全中國。

耽耽，對我中國皆有圖謀。全國統一的時間愈拖，對我愈不利，甚至會出岔子。結果余此行幸不辱命，蔣主席批准了甫澄先生統一四川的計畫，除撥贈槍械彈藥一批外，並准四川自行購運英製輕機鎗一千二百挺，子彈三千萬發，與定製備有七十五種以上口徑主砲的兵艦貳艘及砲艇十艘，加強甫澄先生屬下的水陸武力。當年五月，兩廣事變發生，汪兆銘、李宗仁、陳濟棠等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反對蔣主席。中央為防止盤據江西的共產黨流竄與廣東的叛軍合流，急於從湖北抽調剿共的大軍開赴粵、贛邊區，以資壓制。但是當時中央軍正在湖北洪湖與共軍賀龍所部激戰，中央大軍一旦抽調，則湖北前線立將發生問題。此時余遂自南京回川，持蔣主席親筆函件，向甫澄先生傳達中央旨意。甫澄先生了解出兵援鄂之重要性，立即電報呈覆中央，遵命出兵三萬人，並將於一週內到達宜昌、沙市集結待命。蔣主席遂任命甫澄先生為長江上游剿匪總指揮，坐鎮重慶；撥鄂部隊，則設總指揮部於宜昌，並呈准由第三師師長王陵基代行指揮權責。

川康整軍順利達成

不過統一必須做到真正的統一，而不是文書上的統一。其中的區別是一種只在文書形式上對當前有實力的領導人使用鈎座、鈎鑿等類似的尊稱，自己則用職、屬或其他類似謙卑的稱謂。而真正的統一，是要做到令出必行，並且行得徹底。所以，要統一就不能以文書得到稱謂上的尊卑為滿足。統一全中國的大業必須儘早完成，因為日、俄兩個強鄰，虎視

民國廿六年春，因外界多年來對四川局勢隔閡，與有人陰謀離間四川與中央之關係，而一時川局不穩之謠言甚囂塵上。甫澄先生與中央當局，認為此種現象，對社會安定與地方秩序之維持，殊非合宜，因而迭派代表赴南京，向蔣委員長報告川情，並與中央從大體與根本上研究中央與地方精誠團結辦法。迄五月下旬，余再奉派入京協調時，即已洽定川康整軍方案草案，獲甫澄先生電覆支持同意，更經蔣委員長於六月中旬核定實施。同時並決定成立川康軍事整理委員會，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主任委員，顧祝同、劉湘為副主任委員。七月三日甫澄先生又命余飛漢口，迎迓何應欽先生入川主持川康整軍會議。七月六日



民國二十三年劉湘將軍（前排中）晉京述職偕隨行人員前往中山陵謁陵後留影。

舉行會議開幕典禮，七月七日即發生日軍挑釁而激起我國神聖抗日戰爭的蘆溝橋事變。七月八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何應欽先生宣佈蔣委員長指示：值此中日戰爭可能擴大而需要出兵之際，川康整軍是否應該繼續進行，請到會人員商酌。甫澄先生當即表示：「川康整軍不但是中央既定的政策，而且是全國，乃至於全世界所共知的一件大事，報章輿論，佳評如潮，譽為中國的新希望。如今國難當前，雖中央原規定限三個月整軍完竣，我願意縮短到兩個月，甚至於一個月，便將所部整編完成。至於川康其他各軍是否能與我採取同一步驟，希望大家儘量貢獻意見供中央採納，然後一定要按照各自的承諾，早日完成」。由於甫澄先生這一明確的主張，使到會各將領均無異議，川康整軍會議於七月九日圓滿閉幕，整編工作亦決定在一個月內完成。中央統一四川軍政的決策，遂因甫澄先生衷誠的擁護，而順利達成。

同年八月初，華北風雲愈亟，中日間戰氣瀰漫，中央號召全國軍民團結禦侮。甫澄先生應邀赴京共商國是，余亦隨行。當時到達南京參加開會的，除各方的軍政大員外，尚有共產黨代表朱德等人。據甫澄先生告知，謂朱德對川康整軍行動在此時局下執行，是否將影響戰力一節，表示有所顧慮，而甫澄先生則坦然答謂：「你我對川康整軍問題的看法，由於角度不同而結論各異。你是為我部隊的戰力設想，而我却是以國難當頭團結禦侮的大前提為着眼。老實說，川康如不整軍，中央對於川康軍不一定會放心。如果在此千鈞一髮的最後關頭，讓中央用幾十萬大軍去監視川康軍，則非但這幾十萬大軍不能調動，就連川康軍也不能用。容我說得冒昧些，如果不整軍，則川康軍也好，監視川康軍的中央軍也好，在抗日禦侮的戰爭中，其作用將等於零」。

率師出征請纓殺敵

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開始，甫澄先生於離京返川前向蔣委員長當面報告請中央政府遷川，長期抗戰的意見與建議，深獲嘉許。甫澄先生回到成都後，立即召集川康各軍將領，安排川軍出川抗戰。結果除了劉文輝所屬的二十四軍按兵不動外，其他各軍皆熱烈請纓殺敵，初期決定出川抗戰的部隊共十二個師，甫澄先生亦決意親自領軍出川指揮作戰。

在甫澄先生率軍出川前，曾召集一次高級幕僚會議，會議中各方意見，皆以為甫澄先生勿須親自領軍出川作戰。而甫澄先生力排眾議，且說明其決定出川的理由是：「他多年來致力於四川的統一，並使四川確實成爲中央的一省。迄民國二十五年自動編列預算呈請中央核定，然由於中央部份有關人員尙不能如委員長之了解四川真正意願，而將預算核成不成其爲預算的預算。今年春天又發現了可以誤解的謠言。經此教訓，使他大澈大悟，了解必須有破釜沉舟，奮勇前驅的表現，才能使中央信之不疑。此次在南京面陳蔣委員長呈請國府遷川，確係出之衷誠。若他不親自

率軍出川，或將以爲他尙有盤踞的心理，未必能够放心西遷。因此，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他不能不親自率兵出川」。又說「支持抗戰，必須一切人、財、物力和兵力全部貢獻給國家。所謂全部貢獻，並不是交出就算了結，還必要使其發揮最大的效能。川軍出川抗日，必須有人指揮。以原隸屬不同的部隊受同階軍、師長的統一指揮，即使不是號令不動，也可能不會得心應手，川軍指揮不能如意，戰鬥力就得大打折扣。此亦所以必須親自出川指揮作戰的理由」。

甫澄先生率軍出川後，即由中央委任爲第七戰區司令長官。自四川出發的十二個師分別奉命馳援京滬與山西戰場，川軍在各戰場上雖傷亡慘重，而皆作戰英勇，發揮同仇敵愾的精神，表現優良。不幸甫澄先生勞瘁過度，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以胃潰瘍宿疾第五次發作，赴漢口醫治。卒因病狀惡化，於二十七年元月二十日病逝。其時先生僅四十九歲，中央爲先生節終之典，備極隆重，除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外，更行國葬之禮，營繕墓地於成都武侯祠側，供人景仰憑弔。

四川文獻研究社叢書

劉湘先生年譜 周開慶編著。定價台幣伍拾元

民國川事紀要兩冊 周開慶編著。合售台幣叁佰元

川康淪陷經過 周開慶編著。定價台幣拾伍元

經銷：中外雜誌社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